

第一章 高等教育理念：演进与扩展

- 论民国时期大学教育观念的扩展
——以蔡元培、胡适为例
- 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变革中的发展战略
- 终身教育观的思考
- 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
——21 世纪教育质量观的核心
- 论新世纪高校成人高等教育观念更新

论民国时期大学教育观念的扩展

——以蔡元培、胡适为例

20 世纪前期，大学教育在中国知识界上层始终得到高度重视，以致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倾斜式发展相对于中小学教育而言，带有明显的偏颇。而在观念层面，我国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一直处在由德国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过渡之中，呈现细微变化形态。按通常的观察，人们笼统地将之视为教育近代化的整体历程，而未曾留意其中具体内容不同及变化轨迹。有关的教育史论著也多流于“静态研究”，未对这类问题细加探讨。本文选取蔡元培、胡适作为典型个案，试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观念作一初步的动态考察。

众所周知，蔡元培一生事业的顶点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他所从事的高等教育改革，不仅使北大成为群相效仿的成功典范，他本人也由此获得大教育家的美誉；胡适一生多姿多彩，然其绝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大学教授兼学校管理者（从系主任、教务长到校长），他是以为大学为其基本活动舞台而辐射影响于社会。显然，蔡、胡二人与中国的大学教育关系密切，且深具影响。他们在不同时期对近代大学的认知程度，某种意义上反映了 20 世纪前期中国大学教育观念的变迁。

像清末民初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和胡适对于大学教育情有独钟，甚为偏重。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次长为范源濂，据蔡自述：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办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办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1]对于民国初年蔡、范二人就教育发展何者为先而产生的歧异，胡适后来曾作过一番评论：“民国元年，范源濂等人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他们的见解虽然太偏重‘普及’而忽略了‘提高’的方面，然而他们还是向来迷信教育救国的一派的代表。民国六年以后，蔡元培等人注意大学教育，他们的弊病恰与前一派相反，他们用全力去做‘提高’的事业，却又忽略了教育‘普及’的方面。但无论如何范、蔡诸人都还是绝对信仰教育是救国的唯一路子。”^[2]胡适肯定蔡、范的教育救国路向，却对其各自的选择，下了“普及”与“提高”的断语。胡适讲这番话，已是三十年代中期，可谓事过境迁。其实，胡适当年又何尝不是偏重“提高”的一派呢？

1921年10月，胡适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谈及中国教育，他“主张先从高等教育入手，高等教育办不好，低等教育也办不好。”^[3]其主旨与蔡元培的主张并无二致，这并非受蔡影响，在此问题上二人可谓不谋而合。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即撰发《非留学篇》一文，抨击当时重留学轻国内大学的倾向，强调发展国内大学

是保存固有文化、吸纳西洋文化的关键所在，进而详论发展国立、省立、私立大学的计划与设想。主张“大学之数不必多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全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4]可见，青年胡适留心高等教育之早，思虑振兴国内大学策略之精。在这一点上，蔡、胡显系同道。

蔡元培、胡适对于大学教育的偏重，除了各自教育背景和个人志趣均倾向于“高、深”这一因素之外，还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民族振兴所作的现实功利的选择。胡适关于发展国内大学的设想，其主旨是创造“新文明”，使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在近代文化人中，胡适堪称思想信念专一、变化相对较少的一位，在他身上不大容易见到那种“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情形。写成《非留学篇》整整三十年之后，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看似不合时宜地提出一项《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5]此项计划尽管消逝于内战的炮火声中，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然其内容实质却与他早年的设想有着惊人的一致。在发展大学教育以提升国家地位方面，胡适的思想数十年以一贯之。

“五四”前后，社会上曾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教育之不进步，即是先办大学的弊病。”面对尖锐批评，蔡元培申辩道：“要办好普通教育，必先办好高等教育。所以筹划地方自治，应注重地方教育，就应先设地方大学。”在他看来，“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因此，须“用大学为中心点，指导

各中小学校 俾有系统’。^[6]循此思路 他于 1922 年夏向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提出议案，主张移植法国大学区制，以规范统管地方教育。至 1927 年，大学区制借助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力量付诸试行，偏重大学教育的思想观念终于演化为一项社会试验。试行大学区制失败，原因固多，在大学与中小学教育之间失去基本平衡则是无可回避的要因。

不过，就蔡元培、胡适二人大学教育的实践成果而言，仍以在北大内部进行的一系列革新举措最为突出。1918 年初 蔡元培向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议提出改革大学学制的议案，其核心内容是：大学专设文、理两科 其余各科可设单科大学 如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大学内分为预科、本科、研究科三级。该议案略作修订 即经会议通过，并由教育部批准实施。北大评议会随即根据蔡的提议决定率先在学校内部实施学科调整。北大原有五科：文、理、工、法、商。蔡的改革旨在加强文、理二科，其他学科则予以裁并。其工科并入国立北洋大学，商科以人数少、专业单一，暂合于法科之内，法科则拟与同类专科学校合组法科大学。以其他学科经费转而扩充文、理二科。

蔡元培做此调整的原因有二：一是北大的经费与设备有限，铺张太广，难以发展，不如集中力量扩充中坚；二是蔡的大学观念使然。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蔡始终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 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7]早在民国元年 蔡主持教育部 手订《大学令》第三条：“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 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 方得名为大学 一、文理二科并设者 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 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 或二科、一科者。”显然，其重视文、理基础学科的倾向甚为明显。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调整学科之举，固然与办学条件不足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其大学观念在起作用。蔡元培在回复对大学改制持反对意见的人士时称：“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兴趣不同。文、理，学也。

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8]学与术的判然有别，以及轻重的相应不同，在蔡元培的大学观念中无疑起了某种价值支配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学观念又与蔡元培力图矫正北大风气的现实努力发生了重叠。蔡元培认为：自清末以来“吾国人重术而轻学”，科举之遗毒本已甚深，加之升官发财的兴味相互传染，在北大内部即使文、理科学生亦难安于学业，竞相趋从法、商等科，不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于是有学、术分校之议。^[9]北大的改制在“五四”之前的教育界引发震荡，反对声浪随之而起。其中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从近代文明综合分工的发展特征着眼，批评蔡氏“大学改革之案，不以文理二科之设，视为大学设备之最小限度，而定为大学分科之极限。不以承认单科大学之例外为足，而定单科大学为通则，实与发展大势相悖”。该文进一步指出：“文、理二科之间，亦仅有程度之差，而无种类之别，集于同一大学，绝无滞碍。又况学理、致用两者，本可互有助益，相辅而行。”并强调“大学改制，同时须改良中学，以求并进”。^[10]此类意见，视域开阔，立论合理，至少表明蔡元培的大学观念及其改制举措确有可商榷处，不应因后来北大改革的初步奏效而无视反对意见的合理内涵。

蔡元培的自我辩护并未止息反对之声，“五四”运动期间，国会议员克希克图甚至利用改制问题阻止蔡北返复职，近乎择其弱点而攻之。为此，胡适撰写《论大学学制》一文，出而辩护。胡适巧妙避开大学改制的深层理念，只就事论事地对工科、法科和预科的变动作了有利无弊的陈述，其中关于打破文理界限的说明，准确

反映了蔡氏的主旨，澄清了大学“废止理科，专办文科”的谣传及误解。这是胡适为当时不在北京的蔡校长所作的一次有效辩护。胡适赞成大学改制，似乎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并未深究其他。在大学观念上，蔡、胡共倡“为学术而学术”比较偏重“高深”研究，显然也与他们浓郁的文人气质及教育背景有关。

然而，1920年前后，胡适的两位留美同窗仍对北大的改革提出几乎相同的批评。主修自然科学的任鸿隽致函胡适：“你们尽管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学，却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细的玄谈和火茶的文学就算了事么？”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朱经农亦向胡适反映：“近来留美学界对于（北京）大学有一个批评，似乎有些道理。他们说‘大学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得无关紧要，这种见解太偏浅了。’^[11]这些议论多少反映了北大改革初期某种偏颇确实存在。当时的评论是：“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子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理科发展缓慢，固然由于基础差、经费少，但主观重视不够也是事实，更不必说一些应用性学科已在摈除之列了。这种观念的延伸，便是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也出现偏差。

有段时间，蔡元培将谋求职业与接受大学教育对立起来，甚至将教育中的职业问题与科举求仕完全混同。他曾说：“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教育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职业学校是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12]实际上，20世纪初期，西方职业教育已经提上日程，大学教育观念随着经济、职业等问题的渗入，正在发生变化。蔡元培受19世纪初德国教育观念影响，加之中国人文传统的作用，又鉴于当时须革除科举余绪，故对职业与教育的关系未能做出清晰阐释和实践上的重视，以致在大学观念上略显片面。引人关注的是，批评大学改制的声音主要来自洞悉教育发展趋势的海外留学生群体，他们虽然缺乏现实体验，但在观念上却有“超前”的高度，具有认识价值。

二

不过，在改革北京大学的具体措施方面，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分别引入德、法、美等国的办学经验，使最高学府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生管理及学校行政诸方面呈现新气象。1919年，蔡采纳胡的建议，仿美国“文理学院”之例，在北大废止文、理科的科别，将各专业统改为系，旨在使学生扩大求学范围，做到文、理间相互渗透、互为融通。其后不久，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主动精神，使其自由发展个性，蔡又毅然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实即推行美国式的学分“单位制”。蔡元培自述：“因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厌学之风相互传染，“适教员中有自美国留学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改革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13]选科制的实行被视为“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令人感兴趣的是，蔡、胡联手营造新北大，多少有些以蔡为代表的“德法教育派”与以胡为中心的“美国教育派”彼此合作、各取所长的意味。1920年7月，北大评议会通过的《研究所简章》第一条称：“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明确提出仿行德、美大学模式。1921年夏，蔡元培考察美国大学之后，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制。经此次考察后，“觉得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而“美国大学之研究学问，与欧洲大学一样，其提倡合群运动，亦与英同，惟无科条约束学生耳。美国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之学，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14]美国之行，使蔡元培的大学观念不似此前仅局限于欧洲，视野大为拓展，欲仿行美国大学若

干做法。在当时的北大，他所能依赖的只能是胡适、蒋梦麟等留美学者。蔡、胡于 1921 年以后的洽契合作，实即以彼此教育思想上的认识一致为背景。

此外，在大学管理体制方面则力行“教授治校”。所谓“教授治校”即是蔡、胡均持之甚坚的“由教育家办教育”的主张。胡适热衷于教授治校，他对蔡元培最为钦佩的一点即是身为校长勇于分权的大度胸怀。“五四”复职返校之初，蔡向全校师生阐述其“分权”构想：“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亦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科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15]一年之后，设想中的行政会议以及诸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相继成立，并筹设仪器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不妨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已初步形成教授治校的体制框架，已往由少数人决策的局面已大为减弱，而代之以专业人员的管理机制。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尚存不尽完善之处，但就大学内部体制而言，它无疑是最利于民主决策的机制。无怪乎胡适在 20 世纪 50 年代频频称颂北大自由传统，列举“教授治校”力加宣扬。

历来史家对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史事备加颂扬，几乎无保留地予以肯定。其实，当年北大的新气象应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较为妥当。一是思想政治层面，一是教育文化层面。就思想政治而言，北大的改革造成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各类思潮大行其道，后来为中国新政治提供理论依据的思想流派更由此渐趋活跃，影响一代青年意义甚大。尤其是以北大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更具有十分突出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思想革命意义。后人对北大改革的肯定，

恐怕主要是从这一层面着眼的。就教育文化而言，情况就稍显复杂。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来说，即使建立起较为健全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并配合以积极促进、引导的各方面措施，要见到教育的成效和学术文化的成果也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立竿见影不大可能。因此，观察蔡元培在北大几年的办学成绩应持一个理性分析的态度。

蔡元培和胡适作为当事人曾多次论及对北大改革的评价问题，从中可以探知他们的思考和价值判断。1922年12月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蔡元培总结学校的历史时说：北大在清末师生大多偏重旧学，西学颇似装饰品，民国之初，校内“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不过，当时提倡西学，尚未注意到研究，自民国六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课程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16]后来，蔡氏写有《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等文，较为平实地叙述他的种种主张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蔡元培对于自己的办学成绩还是很自信的。不过私下里，他对诸项改革的评论是：“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17]

胡适向以敢于直言自命，在北大1922年10月发生“讲义费风潮”之后，他认为学校内部的不良状况已表露于外，遂有一番坦诚地评论。他引用古人“暴得大名，不祥”一语喻之北大，指出：“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不祥的事。这样的社会期望，就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做去，也还不容易做到；何况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呢？”那么北大的成绩是什么？胡适认为：“这五年的北大有两大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发展。”但他随即又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自由的风气虽

有了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总之：“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几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因为“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故而同样在北大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会上，作为教务长的胡适率直提出：“国立的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做大众的师表的。”“现在的努力应该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18]这番评论并非一时的激愤之辞。二十余年后，胡适身为北大校长，将蔡元培掌校期间称为“革命时期”，因为“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新，都是北大领导的“不过那时候仍深感人才的缺乏。……现在想起来，总觉有些虚名太大、名不副实之感”。^[19]

胡适的看法是前后一贯的。倘若他人讲此番话，人们或许会怀疑其用意所在，是否有贬损北大改革之嫌，而此话出自胡适之口，不能不令人做冷静的思考，进而对北大“五四”前后的改革从大学教育的专业角度做出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

三

蔡元培、胡适在北京大学改革中的教育主张还被 1922 年颁布的“新学制”加以制度化。北洋政府教育部于是年 9 月下旬召开学制会议，蔡任会议主席。此后在济南举行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草案，胡作为北京教育会代表与会，并在会议中发挥了积极调和各方意见、力促其成的作用。可以说，新学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若干条款反映了蔡、胡等大学教育工作者的主张。其实所谓“新学制”不过是自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及民国六年的修订议案发展嬗变而来。在民国元年的“壬子学制”建立过程中，蔡元培曾发挥重要作用，较为显著者是他鉴于各省所办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入大学甚感困难，遂一律停办，改为大学预

科，附属于大学，其用意是保证大学的质量。后来，胡适对此甚有异议，指为“民国开国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为各省停办高等学堂，使各省没有一所集中学者的机关，造成各省教育文化发展缓慢。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在“新学制”中废止大学预科，而于各省增设高级中学。

民国初年的学制系统，基本沿着清末仿日本学制的学校体系，“五四”前后美国教育观念的影响愈来愈大；“新学制”正是在此背景下应时而生。该学制“总说明”第四条云：“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可见欧美教育观念已得到较多体现。“新学制”的大学教育部分，总的说来更富于弹性。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学制改革，在“新学制”中得到某种确认，如“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这样，中国大学的数量由此明显增多。胡适力主的选科制及学分制经北大等校试行后也逐渐推向全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学制中最具新意的内容是在中学部分，中等学校种类及年限的变动颇大，而这与蔡、胡二人此时已注意到“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有关。

自1920年以后，蔡元培和胡适开始注意大学教育中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胡适首先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到此问题，他从“提高”与“普及”两方面谈教育发展的趋向，提出：“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20]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20]这番讲话虽仍是就偏重提高而言，但在教育界毕竟将提高与普及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明确提了出来，反映了“五四”之后高等教育界已不能不面对如何普及这一现实课题。其后，蔡元培自欧美考察教育归来，也谈及同一问题：“从前胡适之先生曾提出提高与普及两语，正可借以形容欧美大学学风的特色”，大约欧洲大学是偏重提高的，而美国的大学则比

较注重普及，美式“大学的目的是，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社会上需要的技术，不在中等普通学校范围的，都可在大学设科，而且一切文化事业都由大学包办”。不过“美国大学近来也渐渐注重研究，有几个大学全以教师与学生共同研究为主旨……这可见提高与普及，亦是并行不悖”。^[21]

蔡元培先前接受的欧式大学观念即使没有发生动摇，在有了一次美洲新大陆的游历之后，其大学观念无疑较前丰富了，意识到提高与普及并行不悖，较之前几年一味强调大学乃研究高深学术之所的说法显然更为全面。北大那个时期积极致力于平民教育、女子教育，即是注重普及的一种努力。后来胡适对于普及的认识也发生很大变化，他痛感：“今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所以还办不好，基本的原因还在于学生的来源太狭，在于下层的教育基础太窄太小……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他明确指出“教育有两种方法；一是普及，一是提高。把它普及了，又要把它提高，这样的教育才有稳固的基础”。^[22]蔡、胡教育观念的扩展和变化，体现了民国年间大学教育观念演变的一个必经历程。

蔡元培对于教育与职业二者关系的认知，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1930 年 8 月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致开幕辞说：“教育与职业实在是密切关系，不能分割太甚。人受了教育，在社会上还是要服务的，所以职业教育极为重要。”此后不久他在谈及今后教育方针时甚至提出：“今后之教育方针，自小学以至大学，均以养成职业化，增加国民生产为一贯的精神。此种重大之革新，甚合于中国目前的需要。”^[23]从中不难看出教育家的头脑中已融入较多经济的、国家的现实因素。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普遍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蔡元培赞同“学校要社会化”的口号，他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书本上空话太多，实际上

做事、做人的训练太少了，所以，学生到社会上多不能适应环境。现在解决的办法，要使学校能社会化。”他甚至一反传统教育观念，提出了全新的逆向思路：“从前人以为从小学、中学升到大学是正途，在各级职业学校用功是异途；现在要改为学职科是正途，而被挑选出来受大学教育的，才是异途。现在教育当局正指着这个方向进行是对的。”^[24]虽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但其强调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本意无可厚非。

1935年冬，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请注重技术，以增进国力民生，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并修改现行只限八院之大学制，促其注重专科技术，使有分设技术学院或技术学校之余地》的议案。内称：鉴于我国“承袭数千年偏重理论之遗风，有更特定注重技术为教育重大方针之必要”。提议组设中央技术学院，并修订现行大学学制只限设立文、理、法、商、工、农、医、师范八个学院的规定 增加技术学院 以收分工合作之效。如果将此类主张与 1917 年间蔡元培初到北大时的言论相比照，人们不能不承认这位主张偏重学理的大学教育论者的思想发生了多么明显的变化，显然这主要是社会现实对教育的需求发生变化的结果。

中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始终伴随教育观念的不断丰富和更新。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之间的平衡发展、大学教育与社会职业需求的渐趋一致、高深研究与普通能力的良性互动，这些无疑构成现代教育的理想追求和发展趋势。回首 20 世纪前期我国大学教育观念的演变轨迹，将为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始阶段的人们提某些借鉴。

（张晓唯）

参 考 文 献

- [1] 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A]. 蔡元培全集 (7)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97
- [2] 胡适.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A]. 胡适文存 (第 4 集第 3 卷) [C]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377
- [3] 胡适的日记(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40
- [4] 胡适. 非留学篇 [A]. 胡适教育论著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5, 38
- [5] 胡适.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A]. 胡适教育论著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69
- [6] 蔡元培. 在爱丁堡学术研究会晚餐会上答词 [A], 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 [A] 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演说词 [A]. 蔡元培全集 (4)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5, 245, 57
- [7] 蔡元培. 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 [A]. 蔡元培全集 (3)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44
- [8] 蔡元培. 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 [J]. 新青年 (第 4 卷第 5 号), 1918 - 05 - 15(4)
- [9] 蔡元培. 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 [J]. 新青年, 1918 - 05 - 15(4)
- [10] 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 [J]. 新青年, 1918 - 05 - 15(4)
- [11] 任鸿隽致胡适 [A] 朱经农致胡适 [A].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6, 109
- [12] 蔡元培. 北大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 [A], 《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A]. 蔡元培全集 (4)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4, 462
- [13] 蔡元培口述传略 (上) [A]. 蔡元培全集 (3)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32
- [14] 蔡元培. 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A]. 蔡元培全集 (4)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65 ~ 66
- [15] 蔡元培. 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 [A]. 蔡元培全集 (3)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42

- [16] 蔡元培. 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 [A]. 蔡元培全集 (4)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96
- [17] 蔡元培.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A]. 蔡元培全集 (3)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98
- [18] 胡适. 北京大学 [A]. 回顾与反省 [A], 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 [A]. 胡适教育论著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70, 173, 175, 176
- [19] 胡适. 北大开学典礼致词 [A]. 胡适教育论著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61
- [20] 胡适. 提高与普及 [J]. 晨报副刊, 1920-09-23
- [21] 蔡元培. 在北大欢迎蔡校长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大会上演说词 [J]. 北京大学日刊, 1921-09-22
- [22] 胡适.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A],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 [A]. 胡适教育论著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32, 336
- [23] 蔡元培. 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开会词 [A]. 谈今后的教育方针 [A]. 蔡元培全集 (5)(6)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449, 71
- [24] 蔡元培. 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谈话 [A], 请注重技术为教育之重大方针案 [A]. 蔡元培全集 (6)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364, 624

大学办学特色的 形成和变革中的发展战略*

在 21 世纪前半叶，中国高等教育要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使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已在人们心目中达成共识。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促进我国大学办学特色形成的机制和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大学办学特色的理解

什么是大学办学特色？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多种不同理解和表述。我们认为，特色，指的是格外突出的风格或特点，大学的办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

所谓大学“办学特色”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大学办学特色必须是一所大学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办学风格或优良特点，与其他院校没有区别，就不能构成特色，但

本课题由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主持本文由南开大学执笔完成征求意见稿，征求和吸收本课题组各校校长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后，由南开大学进行了修改后定稿。提供修改意见和建议的有：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段宝岩、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等但修改后尚未再次征求上列各位校长意见，故行文中如有不当之处，仍由执笔单位和课题主持者负责。